



孫吳時期朱應、康泰的扶南之行

陳連慶

朱應、康泰的出使扶南，是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從其作用來說，可以和張騫通西域先後媲美。這段史實，過去討論的人不多。現在試圖根據目前能夠找到的材料，提出個人的初步看法。

朱應、康泰的出使，在吳將呂岱平定交州士氏叛亂之後，具體時間當在孫權黃武五年（公元226年）。《三國志呂岱傳》云：“又遣從事南宣國化，暨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，權嘉其功，進拜鎮南將軍。”記錄模糊不清，史實有重大遺漏，把朱應、康泰的豐功偉績，完全歸功於呂岱，這還算是它的小毛病。據《梁書·海南傳序》，“及吳孫權時，遣宣化從事朱應、中郎康泰通焉，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，因立記傳。”詳細地記錄南海各國的真實情況，加強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，促進中外的友好往來，是朱應、康泰不可磨滅的貢獻。通過《梁書》的記載，人們才知道朱應、康泰的具體活動。宣化從事是交州屬吏，可與《呂岱傳》互相呼應。中郎的地位次於從事，故列於第二。可見朱應當是正使而康泰副之。朱應大約出身於朱、張、顧、陸之族，而康泰當是流寓交廣的康居人。《梁書·劉杳傳》所見的朱建安，疑即朱應。建安太守蓋其終官。朱應著有《扶南異物志》（《劉杳傳》作《扶南以南記》），康泰著有《扶南傳》（亦作《吳時外國傳》、《扶南土俗》），和吳丹陽太守

萬震的《南州異物志》，都是重要資料。但是這些著作久已散佚，現在綴輯叢殘，只找到四十幾國和七個洲（相當於島），或竟不到原數的三分之一。這也是無可如何的。所以希望讀者注意，不要以為當時所能瞭解的只有這麼一點點就對了。

朱應、康泰出使的目的地就是扶南。扶南即今柬埔寨的前身，《梁書·扶南國傳》介紹它的地理位置云：“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，去林邑西南三千餘里，城去海五百里，有大江，廣十里，西北（按：北當作南）流，東入於海，其國輪廣三千里。”它是當時湄公河下游的一個強大國家。

《吳時外國傳》和《梁書》記載了扶南國的開國傳說，扶南女主柳葉和摸趺國人混慎的結合，非常離奇。據說混慎，得到神弓，搭乘大船入海，到了扶南，柳葉想要掠他的財物，混慎張弓射其大船，穿度一面，矢及侍者，柳葉懼伏，混慎因納柳葉為妻，在扶南稱王。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烏文國，昔混填（即混慎）初載賈人大船入海所成此國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同書又云：“橫趺國（按：即摸趺國）在優鉢之東南，城郭饒樂，不及優鉢也。”（同上引）岑仲勉把摸趺國比定為恆河口之擔袂，又認為烏文國即Andam群島（按今名安達曼群島）之古名（見《中外史地考證》第145頁）。其說確否雖尚待論定，但摸趺是印度東海岸的國家，烏文國是由印度往扶南的必經之地，扶南是印度移民與扶南土著所創建的國家，這都是不會錯的。後來柳葉生子分王七邑，到混盤況時



復歸統一，混盤況活了九十多歲，死後其子繼立，立三年而死。大將范蔓受國人擁戴，當了國王。范蔓當政時期，扶南得到進一步發展。他自號扶南大王，“治作大船，窮漲海，攻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孫等十餘國，開地五六千里。”范蔓死後，國內發生政變，政權又輾轉落於大將范尋之手。朱應、康泰訪問扶南，正值范尋之世。（見《梁書·扶南國傳》）

扶南國當時已經粗具國家的規模。“諸屬皆有官長，及王之左右大臣，皆號爲崑崙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6引《南州異物志》）“扶南王善射獵，每乘象三百頭，從者四五千人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90引《南州日南傳》）

“亦有書記、府庫，文字有類於胡。”（《晉書·扶南國傳》）據近人研究，扶南的文字和梵文接近。在扶南社會中已經有了公共權力機構，以戰俘充當奴隸，出現了對立的階級，在自由民當中開始了貧富的分化。《梁書·扶南傳》謂朱應、康泰初到之時，“國人猶裸，唯婦人著貫頭，應、泰謂曰：‘國中實佳，但人裹露可怪耳。’尋始令男子著橫幅。橫幅，今干縵也。大家乃截錦爲之，貧者乃用布。”從服裝和文字來看，也可以了解外來文化的影響。由於剛剛進入階級社會，司法機構還很不完備，國中沒有牢獄，以探湯（於沸水中取物）、捧礮（捧燒熱的石頭）、沒水（把不通水性的人放到水中）等神判的方式判斷曲直。范尋養虎五六頭，鰐魚十數頭，若有犯罪者投與老虎和鰐魚，虎和鰐魚不吃，就算無罪。（見《御覽》卷643引《扶南傳》）這種神判的方法，在印度的《摩奴法典》中也可以找到它的淵源。（見中譯本第179~180頁）

扶南國國勢很強，控制了馬來半島，它的屬國屈都昆、九稚、典孫，都是半島上的國家。它和南海各國都有一定的來往。國王范旃曾派遣親人蘇物出使天竺。

屈都昆，亦作都昆。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都昆在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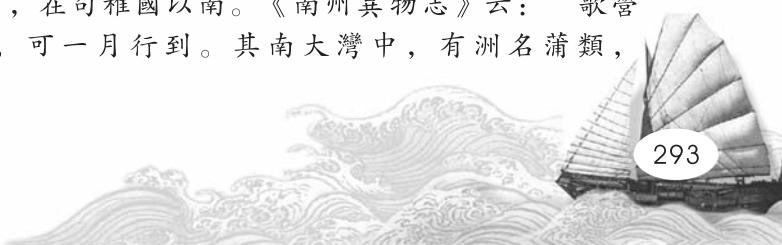
南南三千餘里，出藿香。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卷81引）又云：“流黃香出都昆國，在扶南南三千餘里。”（《法苑珠林》卷49引）岑仲勉以為其他應在馬來半島的北部，大體可信。

九稚國，又名句稚國，在典孫國以南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句稚國去典遜（原誤作遜，今改正）八百里，有江口西南向，東北行極大崎頭，出漲海中，淺而多磁石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）九稚又作拘利、投拘利，或九雅。稚字、雅字均爲離字之誤。投拘利乃Tokola的對音，拘利、九離乃其節譯。其地即馬來半島上的克拉地峽。這裏是一個著名的港口，乃由扶南到天竺的必經之地。

九稚國之西有師漢國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師漢國在句稚西，從[句]稚去，行可十四五日乃到，其國亦稱王。上有神人及明月珠，但仁善不忍殺生，土地平博，民有萬餘家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引）它距離句稚有十四五日的路程，以每日步行六十里計，約有九〇〇里之遙，當在今泰國境內。

典孫國，又作典遜國或頓遜國，在扶南以南三千餘里。《梁書·扶南國傳》云：“在海崎上，地方千里，城去海十里，有五王，並羈屬扶南。”崎字不見於《說文》，《漢書·揚雄傳》顏注訓爲曲岸，相當於現代所謂半島。《梁書》又云：“頓遜之東海通交州，其西界接天竺、安息，徼外諸國經還交市。”形成海上的交通孔道。《梁書》解釋它的原因說，“所以然者，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，漲海無崖岸，船舶未曾得逕過也。其市東西交會，日有萬餘人，珍物寶貨，無所不有。”這裏分明是馬六甲海峽的情況，考慮到其南面還有歌營國，將它比定爲今吉隆坡，大致說得過去。

歌營國，在句稚國以南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歌營在句稚南，可一月行到。其南大灣中，有洲名蒲類，





上有居人，齒正白，眼赤，男女皆裸形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）按：《南州異物志》的這段記錄，不完全正確。此國的地望，前人有故臨(Quilon)、恭瞿(Kongu-deca)等說，把它比定為南印度，皆不可信，歌營距離句稚不過一月的行程，如何會是南印度呢！前人把歌營國和加營國混為一談，因而全無是處。（加營國見《御覽》卷359引《吳時外國傳》，又見《通典》卷188引《扶南土俗》）

解決歌營國的地望問題，全賴《洛陽伽藍記》的記載。該書卷四永明寺條云：“南中有歌營國，去京師甚遠。風土隔絕，世不與中國交通，雖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。今始有菩提拔陀至焉。自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國，北行十一日至典孫國，從典孫國北行三十日，至扶南國。……從扶南國北行一月，至林邑國。出林邑，入蕭衍國。拔陀至揚州（即建康）歲餘，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（指洛陽）”。此書所記自歌營至洛陽的遠近距離，最為明晰。它說北行一月至句稚，與《南州異物志》合。文中不曾談到乘船過海，也未談及有蒲類洲的野人，可見歌營國只能在馬來半島的南端。歌營國的位置是一個關鍵問題。這個問題不解決，隨之而來的幾個國家的位置都無法確定。伯希和知道歌營國在今之馬來半島南，這是對的，但他又說古書歌營或作加營，這是錯的，歌營、加營不會是一個地方。伯希和在《扶南考》中引沙畹說，以為菩提拔陀蓋即佛馱跋陀羅，大誤。佛馱跋陀羅卒於元嘉六年（公元429年）（見《高僧傳》卷2本傳），如何能與梁武帝蕭衍（公元502~549年在位）同時？

在扶南以西與之接壤的國家，有金鄰、林陽、奴後等國，都在今交趾支那半島上。大致方位還可以指出。

金鄰國在扶南以西，以靠近金鄰大灣得名。《異物志》云：“金鄰一名金陳，去扶南可二千餘里，地出銀，人民多，好獵大象。生則乘騎，死則取其牙齒。”

（《御覽》卷790引）《扶南傳》云：“金陳國入四月便雨，六月乃止，少有晴日；六月不雨常晴，歲歲如此。”

（《御覽》卷11引）金鄰大灣即暹羅灣。伯希和以為其地應在印度洋海岸的Mantahan沿岸，岑仲勉以為當在泰國西部晴西至下緬甸一帶。二家的說法比較接近。《異物志》是東漢人楊孚所作，可見魏晉以前，金鄰已與中國聲息相聞。《扶南傳》記載金鄰的旱季和雨季，說明三國時期對它有進一步的了解。

林陽國應在金鄰以西。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扶南之西有林陽國，去扶南七千里，土地奉佛，有數千沙門持戒，六齋日魚肉不得入國，一日再市，朝市諸雜米、甘果、石蜜（原誤作密，今改正），暮市但貨香花。”

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林陽在扶南西七千餘里，地皆平博，民十萬餘家，男女行仁善，皆侍佛。”（《同上》引）由這兩條材料來看，第一，林陽國是一個佛教國，與扶南、林邑不同。第二，它人民十萬餘家，以一家五口計，已在五十萬人以上，在當時是一個大國。第三，它的地理位置，在金陳國以西，當在今緬甸境內，岑仲勉把它定在克拉海峽以北的Htayan，不妥當。

奴後國在林陽國以西。《交州以南外國傳》云：“從林陽西去二千里奴後國，可二萬餘戶，與永昌接界。”

（《御覽》卷790引）東漢永昌郡治不韋（今雲南保山），所轄地或相當廣闊。奴後國既與永昌接界，則必在今緬甸境內。如果考慮到它和林陽毗鄰，訂為今緬甸撣邦高原以北，當無大差錯。

此外，尚有濱鄉專國，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濱鄉專國，出驥（都田切）馬及金，俗民皆有衣服被結髮也。”

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駒井義明以為當在泰國境內，按：驥馬即滇馬，乃雲南的產物，濱鄉專國仍以訂為緬甸為宜。《外國傳》云：“究原有獠民，出錫、鐵、鷄舌香及





赤白五色鸚鵡鳥。究原達永昌一歲。”它距離永昌極遠，當在印度境內。

二

當時對於南洋群島，已經有了明確的了解。《吳時外國傳》大體上以諸薄為中心，區別它的東西各國，《南州異物志》則以歌營為中心，記錄它的周邊諸國。二書所記的角度不同，國名也不完全一致，因此考訂上出現不少困難。但如嚴格掌握它的方位、距離、物產及其歷史情況，不少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。

諸薄國亦作杜薄、闔婆，均為Java的對音。《梁書·扶南國傳》云：“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諸薄國。”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扶南東有大海，海中有洲，出五色鸚鵡。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卷91引）又云：“諸薄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20引）五色鸚鵡和棉布都是爪哇的著名產物，在中國和阿拉伯的旅行記中都有詳細的記錄。

據康泰《扶南土俗》所記，諸薄之東有馬五州，馬五州之東有火州，指的是今大巽他群島。諸薄之東北有北櫨州和巨延州，指的是今勿里洞島和加里曼丹島。諸薄之西北有耽蘭州，薄歎州，大約都在蘇門答拉。在南洋諸國中，諸薄國（爪哇）開發較早，和中國的關係較為密切。

馬五州和火州，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諸薄之東有馬五洲，出鷄舌香，樹木多華少實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馬五洲即今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（Bali），馬五當為馬立之誤。此地又有婆利（《新唐書》）、麻籬、琶離（《諸蕃志》）等不同譯名。同書又云：“火州在馬五洲

之東，可千餘里。春月霖雨，雨止則火燃。洲上有樹木，得春雨時皮正黑，得火燒樹皮正白。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，織以為布，即火浣也。或作燈炷，用不知盡。布若小穢，投之火中復潔。”（《通典》卷188引，據《御覽》卷786補）火洲在馬五洲之東，其地即今龍目島，火山極多，故有火洲之稱。火浣布即石綿製品，當時不知底細，誤以為樹皮所成。在《異物志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玄中記》中都有同類記錄。在曹魏齊王芳景初三年（公元239年）輸入洛陽，成為轟動朝野的一件重要新聞。（見《三國志·齊王芳紀》）

北櫨州和巨延州，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諸薄之東南（按：南當作北）有北櫨州，出錫轉賣與外徼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駒井義明以為北櫨州即Billiton，今印尼勿里洞島。全書又云：“諸薄之東北有巨延（按影宋本誤作迹，據鮑本改）州，人民無田，種芋，浮船海中，截大蚶螺杯往扶南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巨延州，駒井謂即婆羅洲（Borneo），今印尼加里曼丹島。晉人著作多記這個地方。郭義恭《廣志》云：“瓊瑁形似龜，出南海巨延洲。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卷84引）《廣州志》（州字疑衍）云：“大貝出巨延州，與行賈貿易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07引）徐衷《南方記》云“大貝出諸薄巨延州，土地採買之，以易絳青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07引）據諸書所引，其地以芋為糧，以大蚶螺杯、瓊瑁為商品，浮船海中，與扶南貿易，或以大貝與行商交易，以有易無。說明當時海上交通，已頗為興盛。

耽蘭洲和薄歎洲，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諸薄之西北，有耽蘭之洲，出鐵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徐衷《南方草木狀》云：“鐵出耽蘭州，裸夷裝船載鐵，至扶南賣（按：原誤出買，今正）之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13引）耽蘭洲，駒井謂即Tamtalan。又《南方草木狀》當作《南方





草物狀》，與今本《草木狀》毫無關係，今本《草木狀》乃南宋人偽作，余別有考。《扶南土俗》又云：“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，土地出金，常以採金為業，轉賣與諸賈人，易糧米雜物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引）按：古稱室利佛逝為金洲（見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），則此薄歎州，當指蘇門答臘。該地盛產黃金，也產銅、鐵、錫等金屬。

毗騫王的故事，首見於朱建安《扶南以南記》，這個國家也應該在蘇門答臘島附近。《梁書·扶南傳》云：“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，去扶南八千里。”其王頸長三尺，號長頸王。能作天竺書，“說其宿命所由，與佛經相似”。國中“有山出金”。常贈送扶南國王“純金五十人食器，形如圓盤，又如瓦壘，名為多羅。”扶南王屢次派遣使者致書互相往來。這裏已有階級對立關係，出現了刑罰，使用文字，上層人物已經皈依佛教，應該跨進了文明的柵欄，但它仍是極其野蠻。“國法刑罪人，並於王前噉其肉。”“國內不受估客，有往者亦殺而噉之。是以商旅不敢至。”這個國家的位置，過去有噶囉巴（《瀛寰志略》）、伊洛瓦底江及印度洋沿岸（伯希和說）、彭亨（岑仲勉說）、布羅毗騫（《東南海島圖經》）等說，《圖經》說最為近之。據云當地人自稱布羅毗騫，布羅譯言島，毗騫其地名，它是蘇門答臘島中部希阿克對面的幾個小島。

諸書所記的斯調國和姑奴國，其地理位置不易確定，今試為說之。

斯調國，《吳時外國傳》、《南州異物志》以及稍前的《異物志》都有記錄。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、金牀上天竺精舍，天竺王見珠圓好，意欲留焉，臣下諫乃止。”（《御覽》卷699引）《[扶]南傳》云：“斯調國有青石染氈、絳染氈也。”（《御覽》卷

708引）從這裏可以看出斯調盛產真珠和各色染氈，但未記它的地望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斯調海中洲名也，在歌營東南可三千里，上有王國，城市街巷，土地沃美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87）又云：“斯調國又有中洲焉，春夏生火，秋冬死。有木生於火中，秋冬枯死，以皮為布。”《異物志》云：“斯調國有火洲，在海中。其上有野火……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。……其俗常冬採其皮以為布云。”（《三國志·齊王芳紀》裴注引）以上記錄有兩點值得注意：一、斯調國是歌營國東南海島上的一個國家。二、斯調國也有火洲，洲上出產火浣布。我們已知歌營國地處馬來半島的南端，所以斯調國和諸薄國只能在同一島嶼上，關於斯調的今地，藤田以為錫蘭，顯然不對。費瑊以為爪哇，又以為蘇門答臘，又涉兩歧。由歌營國的位置來看，它在爪哇島上是沒有問題的。爪哇島上由南朝到唐代都不止一個國家。

姑奴國，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姑奴國去歌營可八千里。民人萬餘戶，皆乘四轍車，駕二馬，或四馬，四會所集也，舶船常有百餘艘，市會萬餘人，晝夜作市，船皆鳴鼓吹角，人民衣被中國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引）這個國家距離歌營國很遠，又是海上交通的要衝。它的地理位置似乎不易確定。但是不能把它放在斯里蘭卡一帶，那就只能在蘇門答臘去找。《諸蕃志》三佛齊國條云：“其國在海中，扼諸蕃舟車往來之咽喉。古用鐵繚為限，以備他盜，操縱有機，若商舶至則縱之。……若商舶不入，即出船合戰，期以必死，故國之舟輒湊焉”，姑奴國很可能就是三佛齊國的前身。從距離歌營國的遠近考慮，將其首都訂為渤淋邦（Palembang），或許合適。



三

在康泰、萬震的書中，也有關於天竺、大月氏、安息、察牢和大秦諸國的報導。

朱應、康泰沒有到天竺去，但在扶南卻看到扶南派往天竺的使者，也看到天竺回訪扶南的使者。這件事《梁書·扶南國傳》所記較詳：

“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，及見陳吳等（按即天竺使者）具問天竺土俗：云：佛道所興國也。人民敦龐，土地饒沃。其王號茂論。所都城郭，水泉分流，繞於渠瀝，下注大江。其宮殿皆雕文鏤刻，街曲市里，屋舍樓觀，鍾鼓音樂，服飾香華，水陸通流，百賈交會，奇玩珍瑋，恣心所欲，左右嘉維、舍衛、葉波等十六大國，去天竺或二三千里，共尊奉之，以為在天地之中也。”

這個報導，大體上以《吳時外國傳》為藍本，它對印度的政治、經濟、宗教、藝術，多所涉及。它極力刻畫的天竺首都，正是摩揭陀國的華氏城。它首先見於古典作家麥加斯梯尼（Megasthenes）的著作，在《法顯傳》中叫作巴連弗邑，《大唐西域記》中稱為波吒釐子城。遺址在今印度巴特那西北。據麥加斯梯尼所記，華氏城是印度最大的都市，長九哩半，寬一又四分之三哩。城的周圍有道寬闊的壕溝，護城牆有五百七十座城樓和六十四座城門。（見恩·克、辛哈等所著《印度通史》，中譯本第一冊第122頁）法顯對於這裏的王宮也非常讚美，以為“城中王宮殿，皆使鬼神作，累石起牆闕，雕文刻鏤，非世所造。”（見《法顯傳》）六世紀嚙噠入侵，它遭到嚴重破壞，才一蹶不振。從公元前三十年代甘華王朝的衰落到公元四世紀笈多王朝的興起，這一階段的印度史文獻無徵，康泰、朱應的著作多少可以彌補這方面的缺欠。

當時大月氏（即貴霜王朝）仍在統治北印度。強大的迦膩色伽帝國已分裂為若干小王國。年代和史實都比較模糊。在《南州異物志》中也有一些報導。它說：“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，地高燥而遠，國王稱天子，國中騎乘數十萬匹，城郭宮室與大秦國同。人民赤白，便習弓馬，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，被服鮮好，天竺不及也。”（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正義引）別的姑不必論，“國王稱天子”之點，已為印度史家所證實。貴霜王朝的國王自稱為提佛普多羅陛下，提佛普多羅即天子之意，顯然是受了中國的影響。東吳還沒有和月氏通交，而曹魏明帝太和三年（公元229年）十二月，大月氏王波調遣使通魏，魏以波調為親魏大月氏王。（見《三國志·魏明帝紀》）據羽溪了諦所考，波調即韋蘇特婆（Vasudeva）二世。波調的通使曹魏，比康泰、朱應晚了三年。康泰不僅記錄中天竺，而且記了北天竺的烏菴國（《太平寰宇記》卷183引《外國傳》）、東天竺的優鉢國和橫趺國，如果不是殘缺的話，也許會把嘉維、舍衛、葉波等十六大國逐一介紹的。

西亞諸國，《扶南傳》記錄了安息國（見《御覽》卷816），《南州異物志》記錄了察牢國。察牢國的歷史，到目前為止似乎無人討論。這裏順便談一下。“察牢在安息中間，大國也，去天竺五千里，人民勇健。舉國人皆稱王種。國無常王，國人常選耆老有德者立為王，三歲一更舉。土地所[出]與天竺同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引）按《漢書西域傳》有烏弋山離國，它的位置在罽賓與安息之間，應該就是這裏的察牢國。藤田豐八把烏弋山離還原為Gawhd-i-Zarah，釋為Zarah之窪地。白鳥庫吉則謂Gud-i-Zara-又可寫作Zarah-Gud。他們都認為地在阿富汗南部，如果他們的解釋不錯，Zarah就應該是察牢的對音。這個國家成於希臘移民，所以保留着選舉國王的制度。印度史家認為曾在印度的北部和西部盛行的“德婆羅闍”





制度（兩個國王共同統治）起源於希臘、羅馬。（《印度通史》第一冊第184頁）在中亞一帶殘存着古典社會的某些制度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西方的大秦，康泰的書中也有所反映。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大秦國、天竺皆出金鏤織成。”（《御覽》卷816）“大秦國人皆著袴褶絡帶。”（《御覽》卷696）

“大秦國有棗榛胡桃蓮藕雜果。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卷87）“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，及五色水精爲壁。人民多巧，能化銀爲金。國土市買皆金銀錢。”（《史記·大宛傳正義》引康氏《外國傳》）這些記錄當然不免有些浮誇，如所謂五色水精，實即大理石之屬，它的话是有根據的。書中所記珊瑚的產地在“大秦西南漲海，可八百里。”（《事類賦》卷六引《外國傳》）文中的大秦即指羅馬本土，出產珊瑚的地方，在摩洛哥附近的地中海，這些記錄，已為《諸蕃志》、《島夷志略》等書所證實。

對於當時的國際形勢，在康泰的著作中也有通盤的估計。《外國傳》以為“外國稱天下有三衆：‘中國爲人衆，大秦爲寶衆，月氏爲馬衆也。’”（《史記·大宛列傳正義》引）後來迦留陀伽譯《佛說十二遊經》中於三強之外，添上了天竺，那是笈多國王朝興起的反映。

總的說來，當時各國之間的互相交往，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從康泰諸人的著作中即可看出，除了友好往來之外，天竺的宗教藝術已在印度支那半島生根發芽，大體上在扶南以西佛教已有鞏固的基礎，而在扶南、林邑等國顯然是印度教的天下。南洋一帶佛教已經輸入，但尚未達到全盛時代。另外在交州一帶，中國的先進生產技術和思想文化正在逐步輸入。遠到姑奴國“人民衣被中國”，也受到中國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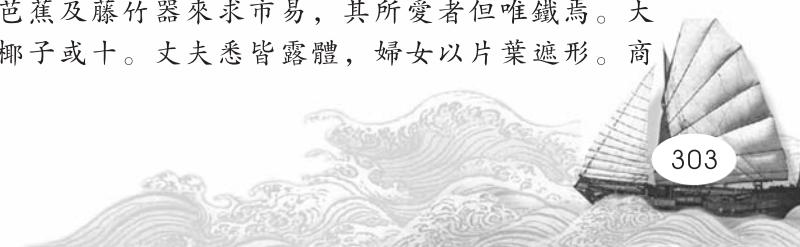
四

當時吳國南方的出海口，除了廣州就是交州。廣州成立在後，在從中國到大秦的航線上，盧容（今越南順化）浦口是第一站，拘利（今馬來半島克拉地峽）口是第二站，迦邏調洲（今斯里蘭卡）是第三站。

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，可二百餘里，從日南發往扶南諸國，常從此口出也。”（《水經·溫水注》引）為甚麼不從東京灣直接出海，不甚清楚。也許是先乘中國船到盧容浦口，然後在該地換乘崑崙船。

拘利口是一個重要出海口，由此可以通過往天竺迦邏調洲。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“發拘利口，入大灣中，正西北入，可一年餘，得天竺江口，名恆水。”（《水經河水注》一）這是說，出了克拉地峽之後，可以沿着緬甸海岸向西北航行，繞過大海灣到恆河河口。所謂大灣就是孟加拉灣。另外也不要忘記，從歌營國到交州還有陸路可循，而且也可通過馬六甲海峽附近的頓遜國到南海各地。康泰、朱應可能到過頓遜國。再遠的地方恐怕就是傳聞了。

由旬稚向西航行，要經過蒲類洲。《扶南土俗》云“（蒲類洲人）西去常望海，過則遮船，將鷄豬山果易鐵器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90引。西字原誤作而，據鮑本改。）蒲類洲，《通典》卷188作薄刺國，云：“隋時聞焉。在拘利南海灣中，其人色黑而齒白，眼睛赤，男女並無衣服。”鮑本《御覽》蒲類作蒲頭，大誤。這個蒲類洲，就是義淨書的裸人國，《蘇萊曼遊記》中的朗迦婆魯斯島（Langabalosu），今印度尼科巴島。義淨說：“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，向東望岸可一二里許，但見椰子樹、檳榔森然可愛。彼見舶至，爭乘小艇有盈百數，皆將椰子、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，其所愛者但唯鐵焉。大如兩指得椰子或十。丈夫悉皆露體，婦女以片葉遮形。商





人戲授以衣，即便搖手不用。”（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卷下第139頁，足立喜六注本）《扶南土俗》所寫，義淨所記，都是同一的地方。蒲類、薄刺都是Balous的對音。

最後一站，就是迦那調洲。《扶南土俗》云：“從迦那調州乘大舶航，張七帆，時風一月餘日，入大秦國”。

（《御覽》卷771）這是由迦那調州到大秦（羅馬帝國）的航線。但是從前人拘於字句，硬要把迦那調州比定為緬甸西海岸，把大秦比定為達嚙，是非常錯誤的。不知在漢桓帝時大秦使者已由永昌入貢，孫權之世大秦商人秦論又自海道東來，如何在大秦問題上還要作翻案文章！如果大秦沒有問題，迦那調州只能定為斯里蘭卡。斯里蘭卡，古代梵文作Tamraparne，在希臘斯特拉波地理書和普林尼的《博物志》中均以Taprobane的名字著錄，自古以來它是東西方貿易的一個中心。

從航海的船隻來說，在《吳時外國傳》和《南州異物志》中也有詳細記錄。關於扶南船的情況，《吳時外國傳》云：

“扶南國伐木為船，長者十二尋，廣六尺，頭尾似魚。皆以鐵鑄露裝，大者載百人。人有長短櫓及篙各一，從頭至尾，約有五十人，或四十餘人。隨船大小，行則用長櫓，坐則用短櫓，水淺乃用篙，皆撐上，應聲如一。”（《御覽》卷769引）按：一艘船裝載乘客和水手一百四五十人，在當時也不算太小。法顯從師子國（即斯里蘭卡）回來，所乘坐商人大船也不過載有乘客二百餘人，只是它還附帶一艘備用的小船，這一點比較先進。《南州異物志》云：“外域人名船曰舶，大者長四十餘丈，高去水二三丈，望之如閣道然。載六七百人，載物萬斛。”（《北堂書鈔》卷137引）這個外域的船比扶南船大的多。容納乘客，後者是前者的四五倍。魏人張揖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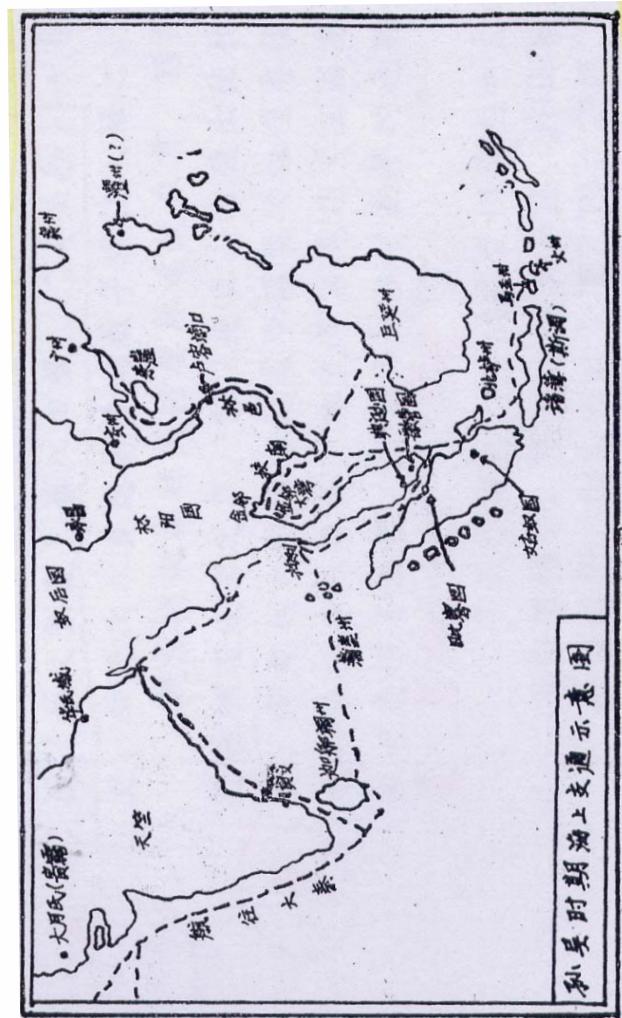
著的《埠蒼》云：“舶，大船也，大者長二十丈，載六七百人者是也。”（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25引）晉人呂忱所著《字林》云：“舶，大船也，今江南凡泛海船謂之舶，崑崙及高麗皆乘之。”（同上卷47引）從這些材料來看，魏晉之世已經有了萬斛的船。吳國航海事業最發達，建安一帶設有船場，它應該擁有最大的船。

最初的南海航行速度不快，西漢時自日南障塞、徐聞、合浦到黃支國，歷時一年。漢朝的譯使出海，“所至國皆稟食為耦，蠻夷賈船轉送致之。”往往“數年來還”。平帝元始中，黃支王獻生犀牛，“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，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。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，漢之譯使自此還矣。”（見《漢書·地理志》下）一個往返至少需要兩年半，有時需要好幾年。三國時期扶南到天竺往返要三年以上。到了東晉末年，法顯從師子國航行到耶婆提（即爪哇）用了九十天，從耶婆提到山東半島的長廣郡牢山南岸（今山東勞山），不過用了八十多天。耶婆提、廣州之間的航程一般只用五十天。到了南北朝後期，“南方諸國，……與西域、大秦、安息、身毒諸國交通往來，或三方四方，浮浪乘風，百日便至。”（見《洛陽伽藍記》卷4）比東晉時期又快了一些。不過這時還不知利用羅盤，“唯望日月星宿而進”，到了陰雨連綿時節，“至天晴已，乃知東西。”（見《法顯傳》）這種情況，直到北宋後期才發生了變化。

番禺在西漢中葉就號稱“珠璣、犀、瓊瑣、果、布之湊”。（見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）到了東漢後期交州崛起，成為南方的重要口岸。後來在番禺設置廣州。這兩個地方同是當時南方的外貿中心。進口的商品，種類更加增多。薛綜向孫權上疏，列舉當時的南海產物，計有名珠、香藥、象牙、犀角、瓊瑣、珊瑚、琉璃、鸚鵡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等十一種；在《南州異物志》中所記更多，它詳



記各種香藥及其產地，又記錄吉貝（棉花）、火浣布和金剛石等許多珍奇物品。如果把它所記的商品和《魏略西戎傳》所記的合起來，是當時進口的全部。這些商品不都是南洋的，有的來自印度、中東，甚至大秦，可以說是世界範圍的商業活動。至於中國的出口商品仍以絲綢為大宗，沒有改變以“黃金雜織”為支付手段的常規。扶南國以戰俘“貿易金銀彩帛”（見《南齊書·扶南國傳》）。東晉時法顯在師子國看到“晉地”的白絹扇，如果再加上朝貢貿易的回贈的絲織品，不難看出海上的絲綢道路已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。但也不要忘記，奴隸也是商品之一，自兩漢以來下迄唐代，崑崙奴始終不曾絕跡。甚至孫權送給大秦商人秦論的黝、歙短人，他們的身分也是奴隸。（見《梁書·中天竺傳》）



[原載《東北師大學報》，1986年，4期；後刊《中國古代史研究》下冊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。]